

人境庐馆藏的《万国公报》之价值

李玲

(广东嘉应学院, 广东梅州, 514015)

摘要: 关于上海《万国公报》的研究, 台湾比大陆起步早, 20世纪60年代华文书局就出版了该报的影印本。而大陆近年来《万国公报》研究虽然极为兴盛, 却一直未出版影印本以供研究参考。黄遵宪故居人境庐藏有4册《万国公报》原刊, 尽管数量微少, 但有其价值在: 一是可确证在甲午之前黄遵宪就已经是《万国公报》的读者。二是此4册原刊可补华文书局影印本的几处缺失, 给学界提供可资参考的资料。

关键词: 《万国公报》; 清末民初报刊; 人境庐藏书; 黄遵宪; 《时务报》

中图分类号: G2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13)01-0239-04

上海《万国公报》及其创办人林乐知、撰述李提摩太等, 是近年来内地学界研究的热点。虽然一直未见该报及其前身《教会新报》影印出版, 但并没有影响研究者对它的兴趣与关注。而台湾《万国公报》研究却比大陆早了几十年, 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李瞻教授早先是在美国加州获读该报, 1968年他得悉台北华文书局将原藏于美国的《万国公报》全部影印出版, 赞曰“诚为伟大之贡献”^[1]。华文书局在20世纪60年代末将《教会新报》《万国公报》与《湘学新报》和《时务报》等汇集成“清末民初报刊丛编”影印出版。当时台湾推动“中华文化复兴运动”, 文化出版界致力于整理古籍、文史资料, 编印大型丛书及专辑, 华文书局的“清末民初报刊丛编”是其中的个案。20世纪70年代, 赖光临、梁元生、王树槐、李瞻、石丽东等前辈的专题研究论文及论著接连出版, 从此该报浮出历史地表。李瞻教授指出该报是“我国最早、发行最久而影响最大的一份政论杂志”^{[1][4]}。可是, 仅热了一阵子, 20世纪80年代迄今, 后继者畸零寥落, 研究成果(专著和论文)屈指可数, 与大陆研究者日益广众、成果迭出, 反差甚大。而台湾各图书馆《教会新报》、《万国公报》华文书局影印本由于常年乏人使用, 几落入撤架的命运, 十分可惜。

据《中国近代期刊编目汇录》第1卷《万国公报》(下文简称《公报》)的著录, 该目是将分藏于北京、上海(即在上海一地, 亦分藏于好几家藏书单位)、湖南、湖北、广东等地的图书馆的原刊之目录汇集齐全的, 可见原刊各地都有馆藏, 可是没有一家图书馆收

藏了全帙, 各馆或多或少都有缺漏, 要洽补整理齐全极不容易。这或许是大陆该报影印本至今未予出版的原因。研究者惟有辗转各家图书馆调阅其存册, 辛劳倍常。然而, 华文影印本亦非全帙, 缺漏甚多。例如: 第三册首页仅手写“PAGE MISSING”两字^{[2][1431]}; 第一册无书名页、无目录, 仅手写“万国公报 WAN KWOK KUNG PAO (A REVIEW OF THE TIME) FORMERLY: 教会新报 CHURCH NEWS VOL, NO 7”^{[2][2]}, 如果手头没有《中国近代期刊编目汇录》提供的《公报》目录对照, 无从知晓这些内容的刊期, 使用不便。朱维铮先生曾指出上图的徐家汇藏书楼“所藏的《万国公报》, 虽有缺损, 但比较台湾影印本来说, 则完整得多”^{[3][30-31]}, 可是, 未予影印出版, 研究者必须舟车辛劳去上图调阅, 极不便利。笔者未得阅徐家汇藏书楼的《公报》原刊, 甚为遗憾, 却有幸获读黄遵宪故居人境庐藏书的《公报》。人境庐存四册, 分别是44册(1892年9月)、48册(1893年1月)、55册(1893年8月)和61册(1894年2月)。这4册虽然书衣均被虫蛀过, 稍有破损, 但值得庆幸的是不仅面目宛在, 而且内文完整无缺损, 品相尚可。对总数达200多册的广学会(前称“同文书会”)月刊《公报》来说^①, 此区区4册在数量上无足轻重, 然而, 其文献价值乃非别家馆藏可取代:

首先, 四册均在书名页右下方、中历出刊时间之月份上, 钤盖印章“人境庐藏书”, 可确证其藏主为黄遵宪, 他是《公报》的读者。钱仲联编撰的《黄公度先生年谱》记载1870年(公度23岁)“因研究天津教

收稿日期: 2012-09-11; 修回日期: 2012-10-15

作者简介: 李玲(1969-), 女, 广东梅县人, 广东嘉应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苏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 近代报刊, 近代文学。

案事,取万国公报及制造局所出之书尽读之”^[4],该年有《教会新报》,尚无《万国公报》,到1874年《教会新报》才改为《万国公报》,年谱所记根据何在?亦或据黄氏从弟黄遵宪之言吗?记述不甚准确。从出刊时间看,这4册均在甲午战争前出刊,彼时黄氏尚在新加坡总领事任内。黄氏身为外交官,订阅中文报纸以及及时了解中外政情,乃日常功课,何况该报是当时国内唯一的政论杂志。其实他应该早在日本使馆任内,就对林乐知个人编纂的《公报》不陌生,因为他的同乡世伯、顶头上司何如璋咏日本风情的诗作《使东杂咏》于1879年1月的《公报》上连载了两次^②。至于黄氏是否当购阅《公报》有年,不止收藏4册,已不可考。自1905年他在家乡病逝,其藏书历经政治浩劫人事沧桑,至今犹存近600种^③,其中有《公报》,幸莫大焉。此四册藏本作为黄氏是该报读者的确凿证据,顺此线索不难贯穿起黄氏师法该报创办《时务报》的行迹。赖光临、李瞻、石丽东、梁元生等论者指出康(有为)梁(启超)以广学会及其《公报》为例,兴办强学会和京师《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时务报》的言论得自《公报》^④;而朱维铮亦言《时务报》“创办初期的言论,从内容到风格,都时时流露剥取《万国公报》的痕迹”^{[3](25)}。他们都有关注康梁受到广学会的启沃而导致《时务报》与《公报》相似或相类,但是未注意或不甚经意到黄氏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这4册藏本可与其他材料相互印证,钩稽与呈现黄氏创办“戊戌变法”时代最重要的新式媒体《时务报》的片断图像。

据梁启超回忆:“彼时穰卿力主办日报,欲与天南遁叟争短长,公度及启超力主旬报之说,乃定议。”^[5]汪康年志在办日报,彼时上海已有现代形态的散页新闻纸,如《申报》,可是黄氏梁氏为何主张办线装书形态的册报呢?究其原因,作为《公报》的读者,他们深受《公报》推重期刊观念的影响:“夫泰西之视月报也,重于日报。日报崇朝敦迫,未遑审慎,传信亦复传疑。月报博考周咨,择之也精,语之也详;模糊影响、琐屑荒唐之事淘汰殆尽。故上而王公将相,下而学士文人无不家置一编,藉资印证。盖规规乎著作之林矣。”^{[2](14970)}期刊周详精审,比同著作。而当时的日报委实无精神,格调不高,连《申报》主笔也这般评述已报:“报纸资料大半模糊而琐碎。”“与吾侪初无若何关系。”^[6]汪康年办日报之志不改,即便《时务报》一纸风行,仍然筹办《时务日报》,可是朋友邹代钧得悉后,反对曰:“日报之杂不如旬报之精萃。”^{[7](2652)}可见旬刊以内容精粹优胜,黄梁二人的决议甚合士大夫的口味。在黄氏写给汪康年、梁启超的两通信函中,

可以看出他学习《公报》的主张。第十通说:“托代《万国公报》及格致书院代派,此法可行。其主笔蔡紫葑攻击者之多,然才调可爱,所译文亦可诵,可走访之一联络也。”^{[7](2334)}蔡紫葑即蔡尔康,曾协助李提摩太翻译《泰西新史揽要》,被罗致《公报》馆工作,深受李提摩太的器重。第二十七通谈及“报馆译书”说:“此事必须与傅兰雅、李提摩太之属确商购定,乃可与人讲定翻译事宜,此语甚要,幸三思之。”^{[7](2351)}两通信函殷殷叮嘱报馆同仁借重西人报馆、书院和请益西学硕彦。

在黄遵宪的策划下,《时务报》对《公报》既有继承又有创新。黄遵宪建议“将边线增肥,将中间小行削瘦,则黑白分明,必较为好看”^{[7](2357)},《时务报》纸墨比《公报》精工。他还建议告白要简明,两页缩为一页,奏稿不可以全删。《时务报》目录只占半页(《公报》目录占一页(两面)),一目了然。《公报》以论说为大宗,有10篇,近20页,内容综合,政、学、格致皆有。而《时务报》,黄遵宪叮嘱同仁:“编排此报,取舍之间,浓谈相间,庄谐杂陈,尤须留意。当为阅报者计其便否,不必专就刊报者诩其富有。”^{[7](2353)}《时务报》刊首论说1至3篇,少而精,梁启超等主笔健笔锐利,掀动朝野。论说非其大宗,其大宗是译报,每期均有占一半(15页)以上篇幅,头条载瓜分之说。在排版上黄遵宪贡献自己的巧思妙计:“又一妙理,本报多至三十余篇,须费半日之力,始能毕读。时文家句句着圈,必不能耐人寻索,正须有一二篇敷衍者,乃可精彩毕露,不致草草读过也。”^{[7](2338)}主张编排要眉目突出,轻重分明,便于读者检览。译报栏目头条载瓜分之说,借外人之口来言说变法救亡的急迫,与刊首论说相呼应,起到唱双簧的效果。读者读过论说和译报头条之后,其他内容略过不读亦无妨。相比之下,《公报》近2万字的论说,连篇累牍,读者需耐烦才能毕读;而其西国近事和电报摘译,内容琐碎,无关宏旨。总之,黄遵宪在参照《公报》的基础上,重视改良版面以增加可读性,讲究排版以便利检读,从而使“此报别具面目,申沪各报应不虑其搀夺也”^{[7](2335)}。无怪乎读者争睹为快,喜之“体例既精,式亦雅飭”^{[7](1290)}。

其次,入境庐藏本可与华文影印本对校,而对校的结果发现华文本有3处缺失:

第一,入境庐藏本4册均有书衣,华文本均无。原刊书衣左上角有一直长形的板框(18.5×3.5 cm),框内上端用楷体大字书“万国公报”,中间依次是宋体小字书写中历的出刊年月和册次,底端用楷体小字分两行书写“每月/一次”。书衣出刊时间随中俗,单用中

历，与书名页不同。书名页板框分三栏，正中楷体大字书名，右小字“中历光绪×年×月”，左小字“西历一千八百九十×年”，中西历并用，再加上前面的全英文书名和目录的那一页，跳脱出西味来了。仅看书衣一眼，俨然是老面孔——穿的是中土传统的线装书外衣，并没有披西士媒体的新外衣。

第二，人境庐藏本四册末尾均附有3页的告白，告白另起页码，华文本无附任何告白。登载告白的是以汇丰银行为首的财雄势大的外商机构(包括医院)，这些洋商机构也是1887年同文书会成立时的会员，显见该报一直得到这些洋商的财力支持^⑤。报馆自言其报销量广，购阅者都是“达官贵介名士富绅”，在其报刊登告白“文字有灵声名不朽”^{[2](16342)}。值得注意的是，《公报》各册无论在英文目录还是在中文目录中，告白(advertisements)都是正文内容的最后一项，不可视为可有可无。常见报刊影印本缺漏告白，可能告白均随报附送，与报刊正文无甚关系，读者不重视，随得随丢，能保留至今的，且能与原刊号合璧的，不多见。可是，对研究者来说，报刊告白却常常保留报馆编务、人事、经济和发行的重要原典资料，是返回当年情境，贴近历史现场的重要渠道。《公报》有3页告白，这正是它与甲午战争后创办的《时务报》迥然不同之处。维持报刊的生命无外乎依靠发行和广告，《公报》一手开拓销场，一手招揽告白。但《时务报》仅靠捐款和销报维持，一再申明“本馆定章不附告白”^{[8](1726)}，“本馆向无付印告白之例”^{[8](2628)}。开报前黄遵宪就开宗明义：“凡销售、承揽、开张一切商业公家言，此报中不可用，望以时检点为嘱。”^{[7](2334)}他就是要《时务报》避嫌，由于士大夫对工商牟利事业，一向抱鄙视态度，如果报馆招揽广告营利，恐怕遭到士大夫的唾弃而不易劝他们购阅。时务报馆的确遵从了黄氏的谆谆教导。虽然翻开《时务报》各册末尾，并非无告白，常有半页至一页的告白，替学会、学堂、报馆、矿务局、书局等机构团体代登告白；这些机构团体或系“本馆兼理”、或系“本馆亦与其列”^{[8](1726)}、或系“同志所创”^{[8](2628)}，均是自家同志，出于公义，不惜贴赔印费代为宣传招揽。至于《时务报》第52册突然登载“代人附登告白”、“资须先惠”^[9]的刊例启示，乃是黄梁与汪康年有抵牾，势如水火，以至康有为弟子全数解馆，此时报馆成汪家生意而改弦更张了。

第三，人境庐藏本61册正文之后，告白之前，还附有一页署“上海广学会启”的《西国教养书目录》，而华文本无。目录开首有两行启示，说“西国经史”“现经西儒译成华文者”，“上海制造局、美华书馆、

广学会、格致书室以及各省教士售书处皆有发售”，因“名目繁多”，特选择“其中切中时事尤有关系者”，胪列其书名、著者和价目，“俾有志西学者得以知其价而就近购取焉”。接着列出“丁韪良书”7种，“花之安书”7种，“傅兰雅书”36种，“韦廉臣书”3种，“林乐知书”2种，“李提摩太书”10种，“李提摩太未印出书”5种，“名人杂著书”15种，“西学报”3种(即《公报》、《格致汇编》和《中西教会报》)。这份书目中不乏十多年前的旧译再版重印的，如：丁韪良的《重订格物入门》《公法会通》《公法便览》和《富国策》，慕维廉的《大英国志》和林乐知的《列国岁计政要》等。亦有旧译新译合璧的，如：“傅兰雅书”36种，即益智书会的各门学科的教科书。如果拿先行研究者熊月之、何绍斌等整理的书目来比对，所谓依“切中时事尤有关系者”而选择的书目，“李提摩太书”之《养民有法》和《生利分利之别论》却未列入。而“李提摩太未印出书”之首为《西国百年来大事记》，就是一年后出版并畅销的名著《泰西新史揽要》之别名；次为《欧洲古今八大帝记》，应该是《欧洲八大帝王传》之别名；最后一种《富国捷径》，则在他们整理的书目表中未有著录^⑥，此书一直未印？还是如前二种书一样，改书名出版了？待考。总之，这页书目并非精审全面，但是可作为研究广学会以及6位西士的资料的佐证，亦可据补梁元生、李瞻、熊月之等前辈著述的不足。

综上所述，人境庐馆藏的区区4册《公报》虽然数量微小，然其作为传世原刊之意义非同寻常，不仅确证黄遵宪是《公报》的读者，更可与台湾华文书局影印本比勘，有其价值在。

注释：

- ① 广学会时期的《万国公报》，总计有多少册？至少有三种说法：一、据《中国近代期刊编目汇录》(1)第29页—406页：起止时间1889年2月—1907年11月，总227册；二、据李瞻先生统计(李瞻、石丽东合著《林乐知与万国公报》第8页)，起止时间为1889年2月—1907年1月，总计216册；三、据朱维铮先生统计，总计237册。
- ② 参见《万国公报》(九)“政事”，台北：华文书局1968年影印本，第5866—5870(10)页、第5893—5897(5)页。
- ③ 详见拙文：《黄遵宪故居人境庐保存的日本汉籍》，《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第105—107页。
- ④ 详见赖光临：《西方传教士所办万国公报研究》，第53—54页(此文曾分章发表于《政治大学学报》第22期、《报学半年刊》4卷5期和《新闻学汇刊》第2期，作者将此三篇汇集成一本总56页的影印册子，藏于台湾政治大学“教职员著作展览室”)；又，详见李瞻、石丽东：《林乐知与万国公报——中国现代化运动之根源》，台北市新闻记者公会1977年版，第25、189—190页；又，详见梁元生：《林乐知在华事业与〈万国公报〉》，香港：

中文大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37-142页。

⑤ 参见梁元生:《林乐知在华事业与〈万国公报〉》,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91-93页。

⑥ 参见熊月之:“广学会出版西书要目(1900年以前)”,《西学东渐和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64-566页。又,参见何绍斌:“1888-1898年间传教士翻译出版的非宗教书刊”,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88-92页。

参考文献:

- [1] 李瞻,石丽东. 林乐知与万国公报——中国现代化运动之根源[M]. 台北:台北新闻记者公会,1977.
- [2] 万国公报[Z]. 台北:华文书局,1968.

- [3] 朱维铮. 导言[A]. 李天纲. 万国公报文选[Z]. 香港:三联书店,1998.
- [4] 钱仲联. 黄公度先生年谱[A]. 人境庐诗草笺注[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 [5] 梁启超. 梁卓如孝廉创办时务报原委[N]. 知新报. 1898-9-26.
- [6] 雷瑯. 申报馆之过去情况[A]. 申报馆. 最近之五十年[C]. 上海:申报馆,1923.
- [7] 上海图书馆. 汪康年师友书札[Z].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989.
- [8] 强学报·时务报[Z]. 北京:中华书局,1991.
- [9] 时务报[Z]. 台北:华文书局,19682.

On the Value of *A Review of the Times* Preserved in Renjinglu, the Former Residence of Huang Zunxian

LI Li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at Jiaying University, Meizhou, 514015, China)

Abstract: Scholars in Taiwan took earlier steps to do research on *A Review of the Times* than in the mainland. In 1960s, the photocopy of this journal was published by *Chinese Book Publishing House* in Taipei to provide references to researchers. But today in China there is no such photocopy. That preserved four volumes of its original versions in Renjinglu, the former residence of Huang Zunxian. However, this small amount of materials has at least two values. Firstly, Huang Zunxian had been one of the readers of *A Review of the Times* before 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894, which could present a similar picture as *Shiwubao* and the importance of Mr. Huang displayed in this role. Secondly, the four original versions could make up for the missing parts of the photocopy published by *Chinese Book Publishing House*, and provide academic circles with a more complete reference.

Key Words: *A Review of the Times*; the preserved books in Renjinglu; Huang Zunxian; *Shiwubao*

[编辑: 胡兴华]